

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前，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核心是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华五千多年悠久文明历史长河中勇立潮头，拥有以莫角山宫殿区为中心的良渚古城及其成熟的道路交通体系与功能分区，以反山和瑶山大墓为代表的王级墓葬，以山前高低坝设施为核心的庞大水管理系统，以精美玉器为载体的上层意识形态，以刻划符号为形式的图文记录手段，以寺墩、福泉山等聚落群为代表的地方性方国，以聚落和墓葬分化为指征的社会分层，共同昭示其已经具有文明古国形态。

石器是良渚文化先民生产生活的最主要工具，同时高档石器也是标志身份地位的重要随葬品。所以，石器工业即石器生产方式是良渚文化社会的基础经济主体与意识形态载体，自然也是良渚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学界已经基于细致的石器产品分析对多处良渚文化聚落的石器工业展开深入讨论，沈家里遗址最新发现规模较大并且保存较好的良渚文化石器加工场，则能够进一步帮助从遗迹结构和良渚古城外围地方社会的视角，完善良渚文化石器工业研究，进而为研究良渚文化何以存续千年提供一些线索。

因何断定沈家里遗址有良渚文化石器加工场

沈家里遗址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湘湖东岸的西山东麓，向东便是萧绍平原，位处山前平原过渡地带。遗址紧邻山体，2019 年经考古前置发现涉及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的古代文化遗址，蕴含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以及汉代和明代墓葬。沈家里与附近的老虎

洞、鲁公桥、祝家桥等遗址共同构成萧山北部地区良渚文化聚落群，西北距良渚古城遗址约 35 公里并且以钱塘江相隔，属于古城外围的地方社会。2023 年 7 月至 11 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以及萧山博物馆共同对沈家里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工作，经国家文物局审批核准发掘面积 325 平方米，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良渚文化石器加工场是重要收获之一。

根据出土陶器形态，沈家里遗址贯穿良渚文化之始终。一方面，出土海量的石器产品，生产链条完整，但是绝大多数为石核与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料，仅有少量半成品并且基本都为废弃残次品，成品更为罕见，是生产地点的典型特征，显著区别于消费地点。另一方面，存在三类相互关联的功能性遗迹，包括石堆、工作坑和烧面。石堆由大型石块组成，绝大多数为有人工取料痕迹的石核，分组堆放成某种形状和空间。这些大型石核为数众多且单体自重较大，发掘区合计 316 件，基本都是颗粒较粗的细砂岩，源自聚落所在山体，属于就地取材的山料，经过初步切割和打磨后集中带回聚落分组摆放，该备料环节属于费时费力的集体行动。工作坑出土了大量石器产品，通常也包含较多红烧土块，应该是石器生产过程中的加工伴生废弃物。烧面即红烧土面的简

称，零星分布于石堆间隙，形状不规则，应是用火行为的遗留。由于工作坑和烧面外围往往被石堆围绕住局部位置，所以三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并且均与石器生产直接相关。另外，于此次发掘区域内没有发现居住、生活或丧葬遗迹。因此，可以初步判断沈家里遗址于良渚文化时期设有一处规模较大、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石器加工场。

另外，根据地层关系将沈家里遗址良渚文化石器加工场至少细分为前后两期，结构不变，但是各遗迹位置发生一定迁移变化。地层堆积中夹杂着巨量石器产品亦是生产过程遗留的，仅 100 平方米左右的范围内记录坐标的第二期石器产品逾 5600 件，还有大量通过筛选获得、无法记录坐标的小型废料，与石堆、烧面和工作坑三类遗迹共同再现当时先民集中且分组进行石器生产活动的工作场景。

沈家里遗址良渚文化石器加工场遵循因地制宜原则

沈家里遗址良渚文化石器加工场出土石器半成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几乎完工，磨制精美，只是部分位置出现瑕疵即遭弃置，足见产品质量把关之

严格，同时也忠实地记录了出产石器的类型与材质情况。

石器半成品类型主要包括石铤、石刀、石斧、石凿、石镞、石犁等日常用具，岩性经浙江省地质博物馆吕剑团队鉴定基本为当地唐家坞组沉积岩类的粉砂岩和细砂岩，也有少量附近岩浆岩类的凝灰岩和灰绿玢岩以及经变质作用的角闪化粉砂岩。另外，出土少量石英或叶蜡石质玉器半成品及原料和废料，类型主要包括玉玦和玉斧。生产工具主要为细砂岩质磨（砺）石以及零星几件细砂岩质石砧、凝灰岩质石锤和水晶质雕刻器。

一方面，石器种类丰富，并没有专门化生产，玉器只占很小比重并且只涉及低档玉质和普通类型。另一方面，先民对本地细砂岩的利用程度极高，这种颗粒较粗的石料在以往研究中一般认为用于生产磨石类工具，但是沈家里出土石器半成品有相当比例属于该岩性，包括石铤、石刀、石斧、石镞、石凿等多种类型，并且大量石核、石坯、废料与几乎所有大型石核亦属于细砂岩。加之废料的岩性多元，可以推知这里不仅是细砂岩石料供应地，同时利用制作磨石类生产工具方便的特点而设立大型石器加工场，广泛接受其他类型石料进行精加工，具有因地制宜的生产特点。

沈家里遗址良渚文化石器加工场

紧依山体，方便大量获取原材料制作磨石和相关石器。相邻的老虎洞遗址良渚文化玉器加工场同样选址于湘湖两岸山麓，亦遵循因地制宜的理念，并且其出产的闪石类玉器、“花石钺”以及专业的玉器加工工具均不见于沈家里，表明高档玉器生产已经脱离开普通玉器加工场。钱塘江中游分水江沿岸的桐庐沈家畷遗址也发现较大规模的良渚文化石器加工场，原料主要为河滩采集的籽料，质地坚硬并且岩性多元。由于不同功能的石器适合以不同硬度或韧性的石料制作，所以，沈家畷和沈家里石器加工场出产石器类型也相对应地颇为不同。换言之，环境背景差异是良渚文化石器工业内涵具有多样性的关键原因。

沈家里遗址石器工业具有突出的特点

良渚古城内外多处土台以及钟家港古河道的生活废弃堆积物中，发现大量与制作石器相关的成品、半成品以及磨石、镗石类加工工具，证明古城内外的石器生产活动相当发达。值得重视的是，古城内的石器加工场类遗址均未发现打制坯料过程中产生的

废料，推知这里不存在制坯活动而是主业精加工，意味着古城内先民势必需要从古城外大量获取坯料和半成品，并且，石器加工场可能也有集中生产某种器形的专门化趋势，比如钟家村遗址可能专门制作石铤，雉山下遗址则可能专门制作石钺。

然而，城外的沈家里遗址良渚文化石器工业则具有突出的自主性和区域性特点：其一，“备料—制坯—精加工”石器生产链条完整；其二，石器类型丰富，尚未专门化生产某种石器；其三，成品或半成品的岩性主要为粉砂岩和细砂岩，其他岩性比例很小，最大特点是对于本地细砂岩的利用程度高。所以，整体而言，沈家里遗址设立大型石器加工场的初衷应该还是首先满足本地良渚文化社会对于石器的切实需求。

萧山北部地区的良渚文化聚落群是功能明确和紧密关联的社会有机体，设立于山麓地带的沈家里遗址大型石器加工场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独特组成。良渚古城外围地方社会的沈家里遗址石器工业自主性强、区域性特点突出，同时也与良渚古城保持较强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良渚文明在以精美玉器为载体的上层意识形态起到凝聚统一作用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了外围地方社会在基础经济生产方面的能动性，遵循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呈现出互动共生的良性发展态势。而这种社会管理模式或许正是支撑良渚文化存续千年的重要制度基础与古老政治智慧，也融入文化基因流淌于漫长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

（作者系沈家里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杜重远:被称为“革命左派先驱”的实业家

□ 沈之骥

杜重远（1897—1943年），吉林公主岭人，曾留学日本，是著名爱国实业家。他曾在奉天（今沈阳）创办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创办《新生》周刊，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救国；出任新疆学院（新疆大学前身）院长，致力于把新疆建设成抗日根据地，一生在瓷业改革、新闻出版、教育等领域建树颇多，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业救国，积极抗日

1916年，杜重远从奉天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毕业后，回家乡任教。这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这一震惊全国的事件，深深刺痛了年仅19岁的杜重远的爱国之心。他认为中国之弱，主要在于实业不振，于是决心尽自己所能为国家作出贡献。

1917年，杜重远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瓷业。1923年，杜重远毕业回国。他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倾全力发展我国的瓷业，在奉天创办肇新窑业公司。杜重远决定第一步先办砖瓦厂，第二步再办瓷器厂。1924年，他兴建了一座烧红砖的新式轮窑，从而打破了日本人在奉天对砖瓦业的垄断局面。1927年，杜重远开始按瓷器生产要求扩建厂房和购置设备，整个工程于1928年春竣工。1928年8月正式投产，1929年出品300余万件，1930年出品600余万件。“取原有之日货而代之，每年所挽回的利款可达一百万元以上”。杜重远的报国志有了实际效果，他兴奋异常：我们就是要“为国家贮蓄实币，以实力来御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将杜重远视作“抗日巨头”，他的瓷器产业毁于日本人的炮火。杜重远被迫携全家人流亡上海，但仍旧没有放弃实业救国理想。后应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邀请，他于1934年来到江西，振兴日新式微的景德镇陶瓷产业。此后，杜重远经常奔波于上海和江西之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他创办九江光大瓷厂，并出任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局长，继续从事陶瓷业的兴建。其间，他主动接济东北家乡流亡关内的学生，并多次筹措资金资助抗日救国事业。

以笔为剑，宣传抗日

在上海期间，尽管实业救国举步维艰，杜重远仍旧通过撰文、办刊等方式，积极投身到宣传抗日救亡的大

潮流中。他一边担任“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总干事，积极推进“发展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一边为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撰写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

为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杜重远从1931年到1932年行经八省，遍访十余城市，作过近百次讲演。当他听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决心“打到最后一人和最后一弹”时，心情激动不已，遂提笔写下《民族异彩》的通讯报道，高度赞扬“一·二八”抗战精神，并号召对日作战“须全国共同起来作积极的奋斗”。邹韬奋高度评价杜重远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为着抗日救国主张，四方奔走呼号……正因为他有实干的经验，不是为做文章而做文章，所以他的作品感人特别的深，使读者得到益处特别的厚”。

1933年12月，《生活》周刊不幸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查封无法复刊。为了延续和扩大抗日宣传，杜重远通过自己实业家的社会关系和特殊身份，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登记备案创办《新生》周刊，自己担任总编辑和发行人。1934年2月，《新生》周刊创刊，明确把“为救民生存而奋斗”作为办刊宗旨，主张抗日、反对妥协。当时的文化名人胡愈之、邹韬奋、柳湜、毕云程等都是该刊主要撰稿人，杜重远本人则经常在“老实话”栏目撰文，揭露日军暴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卖国罪行，文章通俗生动、深刻沉痛，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5年5月，《新生》周刊刊登了并无恶意的《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帝国主义却借此提出“有辱天皇”“有碍邦交”的无理指责。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查封《新生》周刊，杜重远也因此入狱。《新生》周刊尽管存续时间不长，但其最高发行量曾达10万多份，为抗日救亡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

把新疆学院办成“第二个抗大”

入狱期间，杜重远受到周恩来等人的关怀，并与中共地下党员有了较多联系，开始阅读一些马列著作，逐渐懂得一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道理，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真正抗日，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主张。1936年9月，杜重远刑满释放，随即赶往西安与张学良等共商大计，对张学良转变思想

并促成西安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10月，杜重远到新疆首次考察。回到武汉后，他向周恩来汇报了新疆之行，并提出想再次去新疆，把新疆建设成抗日根据地，培养干部，作持久战准备的建议。在周恩来同意和支持下，1939年1月，杜重远抱着“为祖国奠定最后抗战基地”的愿望到新疆安家。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委任杜重远为新疆学院院长。

为了解决师资不足问题，杜重远聘请沈雁冰、萨空了等人来校任教；请来赵丹、于村等人发展新疆文化事业。当时新疆书籍匮乏，他给邹韬奋写信说：“新疆学院，除一座旧营房外，别无长物，不要说物理化学，生物卫生种种设备，连教课的书籍也不完全，真是一座沙漠荒地……”在朋友帮助下，杜重远购买了三十车书籍带到新疆学院。杜重远对学院的教学内容也作了调整，增加了联共（布）党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并强调教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他自己身体力行，在讲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时，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呼吁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抗战到底。

杜重远在新疆学院办学期间，是新疆学院充满生机、兴旺发达的时期。他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始终坚持抗日斗争，培养出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各族爱国青年，因而受到新疆各族人民和各族青年的敬重。当时内地的人们称新疆学院为“第二个抗大”。

杜重远一心扑在新疆教育事业上，宣传爱国进步思想，赢得了当地人的爱戴，却引起了反动军阀盛世才的嫉恨。1940年，杜重远被软禁。其间，周恩来、宋庆龄等人曾设法营救，但是盛世才一意孤行，最终于1943年9月将杜重远秘密杀害。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指出：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杜重远先生等“为了人民的事业而遭受牺牲，他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自我牺牲，为人民尽忠的永久典范。他们和一切为救国运动献身的人民英雄们将永垂不朽！”1983年，在杜重远被害40周年时，邓小平题词：“杜重远烈士永垂不朽”，邓颖超题词：“革命左派先驱，爱国勋党英烈”。



（上接1版）充分运用各类数字平台的传播功能，大力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传播，改变过去“大水漫灌”方式，实现宣传报道的精准投放与推送，抵达更广泛用户，提高正面宣传的到达率、阅读率、吸引力和感染力。

发挥数字化优势。数字时代背景下，宣传思想文化的工作模式、工作场景、传播场域都发生了深刻改变。坚持以数字化重塑舆论传播格局，整合各级融媒体阵地，通过平台再造、流程优化、资源共享，打造区市县一体化全媒体传播大平台，构建舆论宣传“一张网”，做大做强“旗舰媒体”，形成舆论宣传的强大合力。用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加快建设数字文化馆、数字博物馆等各类数字文化设施，打造数字新场景，让观众在置身数字空间中以情景模拟、情景再现等进行文化深度体验、知识深度学习，不断增强公共文化及数字化宣传内容的供给能力。

用好数字化技术。正视舆论生态新变化，树立大数据观念，强化数字技术在网络舆情综合治理中的应用，以新技术新应用改造舆情系统，拓展处置引导功能，把单一的舆情监测预警系统升级为网络舆情综合治理平台。加强与各级网络舆情综合治理技术平台的协调联动，构建区市县一体化舆情监测预警处置引导格局，以数字化赋能舆情应急处置，切实提高网络舆情发现力、研判力、处置力、引导力，及时消除负面舆论影响，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

坚持以融合发展为路径，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内涵式发展

融合发展是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和重要方法。我们要深化“融”的理念、强化“合”的力量，全力做好媒体融合发展、文旅融合发展、铸魂育人融合发展三篇文章，扎实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挺进新赛道、开辟新境界。

着力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立足“内容+”“技术+”“产业+”和“资本+”理念，打破既有利益结构藩篱，重塑内容生产、技术支撑、管理保障体系，把最优质的资源整合到移动端，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加快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传播体系，打造引领媒体变革的技术集成中心、数据交互中台、融合传播中枢，推动形成“全区一张网、共享一朵

云、共建一平台、融合一盘棋”的良好局面，实现媒体聚合传播，放大主流舆论声量。探索发展“新闻+政务服务+商务”运营模式，发展“传媒+N”新业态，增强自我“造血”功能，闯出一条媒体融合改革发展的新路子。

着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更多文化内容、文化符号、文化故事融入旅游景区、度假区，借文化“爆款”催生旅游“爆点”，以文化“变现”驱动旅游增值。围绕文化品牌，策划一批精品文化旅游路线，开发一批跨境精品旅游路线，推动优势资源“串珠成线”。加快“文旅+”发展，推动文化、旅游与教育、体育、科技、康养等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推进非遗展演、文艺精品进景区，培育一批特色鲜明、互动性强的文旅演艺活动。探索“旅游+直播”等文旅营销新模式，把更多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留量”。做优做强智慧文旅平台，提供定制化、差异化文旅产品和高品质旅游体验服务，满足游客个性化的体验需求。

着力推动立德树人与以文化人相融合。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建好用好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升思政宣讲品牌影响力。积极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抓好重大主题创作，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统筹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以“一老一小”、残疾人、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为重点，开展“文明暖心”志愿服务。因地制宜推行移风易俗“五个统一”工作法，推动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文明新风尚。坚持以城促乡、城乡联动，推进城乡文明创建融合发展，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坚持以基层创新为重心，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有效覆盖和落地生根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服务对象在基层、工作主体在基层、任务落实靠基层，必须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强化闭环管理，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落到位。

在完善制度机制上下功夫见成

效。积极构建大宣传的工作机制，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紧密结合，把分散在各条块的资源整合起来，把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文化支撑“四个作用”协调起来推进，把各方积极性和优势调动起来，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强大合力。发挥好宣传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机制的作用，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管控“第一示警”和“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报告、早处置”的“五早”工作机制，通过强化相互协作、多方联动、全员参与，打好“组合拳”，奏响“交响乐”。

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上下功夫见成效。牢牢把握正确方向，进一步理顺国有文化企业管理体制机制，探索完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管理、提高管理效能，以管理促发展促繁荣。适应文化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快推动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转变职能，加快国有文化单位改革，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实施国有文艺院团社会效益考核评价，不断激发国有文化单位发展活力。积极推进版权赋能，引导支持出版印刷和发行单位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出版业、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充分激发创新创业的内生动力，遵循受众互动化、社交化、消费生产一体化等传媒发展规律，优化整合资源，建立适应全媒体发展的生产经营、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绩效考核等内部管理制度，不断增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用好活用各类人才上下功夫见成效。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牢牢抓住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这个“牛鼻子”。主动适应网络时代、数字时代，建立健全“育、引、用、留”人才培养工作机制，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赋予新动能。大力实施文化领军人才、文化青年拔尖人才项目，加大对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特别是优秀青年人才的培养支持力度，努力打造一批领军人才、高端智库人才、全媒体人才。创新“引进来、走出去”方式，探索建立与全国一流高校、文艺院团等合作培养机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拓展平台载体，推动建设文化名家（大师）工作室，大力推行“揭榜挂帅”制度，不断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和承载力。构建科学完善的人才激励政策体系，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形成“近者悦、远者来”的良好态势，确保各类人才在桂安心顺心、创新创造。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